

占领香港笔记

——从广场到马路的 72 小时突变

文 / 张洁平

(自由撰稿人, 现居香港)

一切都发生得太快, 打乱了所有严密布局的计划, 无论是起事者的, 还是管治者的。而一切又发生得太自然, 像一场压抑已久的高烧, 淋漓尽致。

香港人大概从来没有想过, 有一天自己会去占领全城的马路。争取民主普选是一场长达 30 年的谈判, 而如果争取失败, 则有一套按部就班的抗命行动——这大概才是香港人做事的方式——在 9 月 28 日之前, 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。

「占领中环」运动酝酿了整整 20 个月。从去年一月, 法学教授戴耀廷在报纸上提出构想开始, 历经舆论预热、民主商讨、公民投票, 先礼后兵, 直到全国人大真的否决了香港真普选的希望, 才启动行动, 预备要「占领中环」。如果行动按原计划进行, 这恐怕会是世界历史上姿态最卑微的「公民抗命」: 我们讲尽道理, 不得不「抗命」, 「抗命」的方式, 不是最初构想的「瘫痪金融中心」, 而是选择在节假日, 以对公共秩序影响最小为前提, 坐在马路中间(这条马路节假日会被批准为行人专用区), 等待被捕, 用自我牺牲, 结束整场运动。

「占中」核心团队的成员曾私下告诉我, 在人大决议给香港普选「落闸」之后, 他们原本对行动本身已经非常悲观。「香港人太现实」, 他说: 「知道没用

的事情不会去做」。「占中」内部，对愿意走出来、坐在马路中间「自我牺牲」的人数预期是 5000 人，占领时间是最多两天。这是一个悲观的预期，形势逼他们只敢做最坏的打算——他们把行动日定在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「国庆」，因为中国领导人不愿意在喜庆节日生血光之灾，便可能避免残酷镇压。

谁也没想到在 9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，全港学生大罢课之后，形势突变。

9 月 26 日晚上 10 点 30 分，在结束了一个星期的罢课之后，连日集会的学生、市民正待散去，学民思潮召集人、17 岁的黄之锋在短暂宣告后，突然带头翻越围栏，冲入「公民广场」——这一块政府总部门前空地，是规划的公众集会用地，曾在 2012 年反国教运动中成为最主要的抗议地标，并因此得名「公民广场」，而在 2014 年 7 月 17 日，接近人大表决香港普选方案的日期，港府突然封闭这块用地，直至 8 月底再度开放时，四周已经满满修建起两米高的钢铁围栏，实质性破坏了这块一千平米空地的集会效应。那一天晚上，在「重夺公民广场」的口号带领下，学民思潮的黄之锋、学联的秘书长周永康、副秘书长岑敖晖等 100 多名学生，不顾一切冲了进去。黄之锋很快被警察按倒在地，用胡椒喷雾制服，并直接拘捕，其他百余名学生则由赶来增援的警察团团围住，困在「公民广场」之中。正在散去的人群汹涌起来，聚集在公民广场的铁栏杆外不肯离去，并有更多人赶来声援，人们整晚高喊口号：「释放学生！」「学生无罪！」「警察可耻！」

这一夜，因为一个试图进入常规集会空间而被阻止的举动，引发了形势第一次的根本转变：你不许我进入公民广场，我就去外面开拓新的广场。

9 月 26 日，据学联的估计，有数千名市民在政府总部四周的区域通宵留守。这片不规则的区域包括了政总建筑物旁侧的一条马路，一个圆形交通路岛，和立

法会后门旁的一小片空地，留守的人们开始把这里叫做「自由广场」。这一个夜晚，集会者第一次见识了胡椒喷雾——警方 6 度施放胡椒喷雾试图驱散集会，并曾动用警棍，并无防备的学生则撑开雨伞抵挡胡椒喷雾，并搬动铁马在「广场」的各个入口设置路障，抵挡警方清场。附近天桥上围观的支持者也撑开雨伞掷下，让它们飘落到集会者手中，在整晚紧张对峙的气氛中，定格了颇为浪漫的画面。

他们终没有能够阻挡警方。周永康、岑敖晖等闯入公民广场的学生在 9 月 27 日一早的清场行动中被带走。而集会者亦因此决定，死守这里不走，直到警方释放所有学生为止。「占领中环」运动的发起人戴耀廷、陈健民、朱耀明以及泛民主派许多重要人士很快赶到到现场声援留守学生，到了夜晚，在新的「自由广场」——恐怕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、最不规则的广场——聚集起将近五万人。

学生们在马路上、天桥上、草地上、以及四周的工地上或坐或躺，并成立物资站、急救站，接纳市民源源不断送来的食物、水与抵挡胡椒喷雾的雨伞、口罩。他们还搭起了帐篷厕所，不过因为多数人觉得不够卫生，立法会外的公共厕所仍然排起长长的队伍。

9 月 28 日凌晨 1 点 40 分，经过占中与学联的共同商讨，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宣布，占中放弃原定的计划，决定即时、就地启动。仅仅十几个小时以前，他还声明不会提前开始占中，也没有计划把占中地点转移到政府总部。但造势不如就势，这十几个小时里，现场人群的生动能量显然改变了他们的决定。

这个决定令不少支持占中的市民叫好，却也引起现场学生的争议。许多学生在凌晨两点左右离场，他们说自己是来支持学生运动，呼吁释放被拘捕的学生，却没有打算要「占领中环」。但留下来守夜的年轻人，仍然接近万人。

仿佛对这一变化措手不及，尽管留守者进入高度警惕的防备状态，但这一个夜晚，警方没有任何行动。守了一夜的学生在白天疲乏离去。在「自由广场」人数最少的时候，9月28日下午1点30分，警方宣布，开始清场。他们实施人群管制，封锁政府总部附近示威区的所有入口，只准出不准入，并称「任何公众人士强行进入将被检控，场内人士将被拘捕」。学联及占中则立刻通过网络告急，呼吁市民前来支援，一起守住这里。

谁也没想到，短短两个小时之内，四面八方赶来的群众就聚集在进入政总示威区的各个通道上，不但对警方封锁线形成了反包围之势，更随着聚集人数越来越多，由于无法进入政总示威区，反而一直蔓延到了附近的交通干道上。人们干脆坐下，就地在马路集会。

9月26日，从「公民广场」的封闭演变为开拓「自由广场」，是抗争的第一次空间转化。9月28日，从「自由广场」的封闭演变为占领马路则是第二次，这一次，也彻底地转变了抗争的性质。

到下午4点半，人们已经完全占领了金钟的车行主干道，并向东蔓延到湾仔，向西蔓延到中环。宽阔的车行路和起伏的高架桥上坐满了人。天桥上也挤满了人。被封闭在「自由广场」内的学联同学们看到手机里转播的场外画面，泣不成声。占中三子也激动不已，这是近两年来承受着巨大压力的他们，不敢想象的画面——戴耀廷当初在报纸上大胆构想，也只说「一万人占领中环」而已。

不过，作为行动最初的召集与组织者，他们还来不及对隔离在外的数万群众（不断增加中）做出呼应，警方的行动就已经令事态再次急转。

根据梁振英下午3点半记者会上的表态，警方会「果断依法适当」对付「占

中」。当晚 6 点开始，警方突然对和平示威人群使用催泪弹，据后来警方公布的数字，在 9 月 28 日夜晚到 9 月 29 日凌晨，香港警方共在 9 个地点，发出了 87 枚催泪弹。这是自 1967 年左派暴动以来，警察第一次对香港市民使用催泪弹（2005 年 WTO 在香港召开会议期间，警方曾对南韩示威者使用过催泪弹）。

所有人都震惊了。当天下午有家长带着孩童来参加集会，没有人想到两三个小时的集会就会引来催泪弹。而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催泪弹并没有驱散人群。被激怒的集会者回到原地坐下，有更多的人被电视直播画面或者网络图片震惊，决定出门前来声援，从 6 点警方抛出第一枚催泪弹开始，从中环到湾仔马路上的人群不减反增，晚上更增加到是十数万人，更蔓延到九龙的旺角地区。

晚上 10 点 20 分，学联突然发布声明，称从多个渠道获得消息指警方已经以橡胶子弹驱散示威者，呼吁示威者全面撤离，「保留实力，择日再会」，占中也即做出相似表态，「一旦开枪或启动音波炮，呼吁市民全面撤离」。然而，仍然有大批市民选择在马路上彻夜留守。一直到 9 月 29 日白天，人群依然没有散去，反而越聚越多，在港岛从中环一直铺到铜锣湾，在九龙也从旺角蔓延至尖沙咀。

催泪弹变成一个有形而具体的「镇压标志」，不仅激化了局势，促使更多普通市民走出来坐在马路上，也实际上加剧了运动性质的转化：这已经不是由几个领袖人物发起的「占领中环」运动，也不只是学联或者学民思潮发起的学生运动，而成了一场因为「敌人」团结起来的，真正去中心化的全民运动。

这个「敌人」，表面上是催泪弹，实际上是抗争者赋予它的政治含义——一个作为北京政府傀儡的香港政府，对香港过半数市民民主诉求的不承担，甚至协

同打压。这个时候，是否要遵循「占领中环」的理念和议程已经不重要了，每一个坐在马路上的人，都带着自己个体的愤怒和诉求，他们的最大公约数，恐怕只有那个人大已经明确否决了的真普选。

被困在「自由广场」之内的主台很快就失去了作为主台的意义。9月28日，占中三子、民主派大佬、学生领袖都坐在主台上，没有警察去拘捕他们，催泪弹都瞄准了马路上的群众。9月29日，警察撤防，也没有群众再进入「自由广场」。3公里长的马路已经成了新的「广场」，而且无边无际，无人可以真正代表。

在这条马路上走一遍，你可以看到真正的香港精神：那种井然有序、令人惊叹的自组织，和平理性的抗争方式，浪漫的歌声和字条，周围店铺的友好，深夜里和警察一起清扫垃圾的年轻学生。还有一边施放催泪弹，一边全副武装向前推进的警察，扶起在烟雾中摔倒在地的市民，送到安全区。你知道这是不管多么愤怒，都没有改变的香港，良好的公民社会根基，让自主和自律在绝大多数公民身上完美统一。

但你也知道，在对面的阴影里，还有一种力量，也不会改变。一旦「广场」无边无际，无人代言，无法收场，这也是真正的危险临近的时刻。